

## 为什么内卷（而非演化或革命）是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的主要用词？

黄宗智

我对演化（evolution）、革命（revolution）和“内卷”（involution）的思考原先主要来自自己关于农业的研究。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中国农业在作物种类和农田结构方面主要仅有相对细微的**演变性**改进。那样的变化应该和**革命性**的变化——譬如，从旱作物转入水稻——区别开来。其演变形式多是**内卷性**的，即伴随相对细微的调整而来的逐步递减的边际报酬，最终进入一种越来越固定难变的“内卷化”（involved）状态。

之后，我将关于演变性、革命性和内卷性的不同变化类型援用于自己关于中国历史中其他议题的研究，包括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演变，譬如，从分权的封建到集权的郡县制度的**革命性**演变，其后则进入相对细微的演变性或**内卷性**调整，而非革命性的变化。

无论经济还是行政方面，演变性、革命性和内卷性的区别都会对我们的思考有一定帮助。

在西方的历史学术研究中，演变性相对革命性的区别一直都较多被引用，内卷性则相对罕见。与其不同，我关于中国的研究则更聚焦**内卷性**，即越来越紧密、顽固难变的状态。

与西欧的历史相比，中国历史的最突出不同是，长期不变的相对高人口密集度，特别凸显于很低的人均耕地面积——长期以来都以中国的基本土地面积单位“亩”来计算，亦即相当于英美的基本单位“英亩”的仅 1/6，西欧法国的公顷（hectare）的 1/2.471。如此的基本土地计算单位间的差别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三种不同农业制度间的不同密集性。总体

来说，中国农业人均土地要远比英美和法国的少，这也就意味着更高度的劳动密集化。

“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一词的使用度因此也远高于英美或法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中，相对低密集度的人地比例可见于汉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相对高密密集度的人地比例见于汉代的郡县制度，其后进入一段时期的集中和分散之间的拉锯，而后则是唐宋及其后长时段的中央集权的治理和逐步内卷化的农业。也就是说，低密集度农业和封建制度，与高密密集度农业和中央集权两者之间的差别，不仅可见于西欧和中国历史的不同，也可见于中国本身历史中的春秋战国与秦汉一统间的差别。而后更鲜明地见于南北朝的分裂和隋唐一统间的不同。再其后则较长期展示为相对高密度的人口和中央一统的行政，以及内卷化的农业，也成为“帝国晚期”的明清时期的鲜明特征。

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中，相对低密度的人口和分裂的统治，以及相对高密度人口和中央的集权，是带有一定连带关系的。唐宋和明清时期的相对高密度人口和相对高度中央集权两者的结合不是偶然的。

它们是中国“内卷”形态中的基本制度特色，相对少见于西欧的历史。明清时期的中国乃是一个越来越相对高度内卷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也是一个相对高度中央集权和官僚化的国家体系。正因为如此，“内卷”（involution）一词，而不是“进化”（evolution）或“革命”（revolution），乃是笔者所采用的关于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的至为重要的关键词，也是其与西欧之间的关键不同。